

出小镇记

# 老驳壳

黎明

老驳壳坐在我家客厅，地板上搁着一箱蟹。老驳壳说，这是朋友硬给他拿的，家里还放着好几箱，让我们“帮忙吃掉点”。

吴地风俗，送蟹是“谢谢”的意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厚信封，递给我爸。我爸瞪着眼睛说，干嘛。

老驳壳说，这里是五千，数一下，还有一万五再等等。我爸说，我们暂时不用钱，等你宽裕点再说。

老驳壳把钱塞过来，我爸推回去，又塞过来，再推回去。我爸抓住老驳壳的手腕，老驳壳叫我爸的名字，厉声道，你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信封落进我爸的口袋，我爸苦笑，你跟我瞎客气啥。我妈问老驳壳，最近身体还好吧？老驳壳得意地说，上个月社区组织体检，报告拿到手，肝功能十二项指标，十一项超标，小护士吓都吓死了。老驳壳爆发出一阵放肆的笑声，我对她讲，小妹妹，你摸摸我的肌肉，像不像快要死掉的人。

我妈忧心忡忡地说，以后老酒不要吃了，肝都要硬成石头了。老驳壳说，吃到哪天算哪天。

老驳壳起身告辞。我妈翻出两箱桂圆核桃粉，说对肝脏有好处。我爸对我说，送你水根叔，顺便从老街带半只烤鸭回来。

老驳壳连称不用送，我拎起核桃粉，先出了门。老驳壳追上我。他气咻咻地说，你爸这个人真是，我不说他了……对了，听你爸讲，你年底也快结婚了，阿是？

我说，是。老驳壳欣慰地点点头，你也年纪不小了，总算结了你爸一桩心事。又问，女方是哪家人，家里干啥的，聘礼有多少？我说，浙江人，家里嘛就是普通职工，至于聘礼啥，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老驳壳痛心疾首，连声称我“吃亏了”——以你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学历，就该找个有钱人家的，阿是？唉，你爸事先也不问问我，我认识的董事长不要太多……家里有七八套房子，钱多得花不完，结果么，女儿找的男朋友不称心……

少奋斗二十年，阿是？他总结道。我说对对，水根叔你说得有道理，可惜我开窍晚了，如今木已成舟，么得办法。

他感慨了好一阵，又问我学校的工资，你们大学教授，接项目，出去讲讲课，日脚应该蛮好过阿是。我说惭愧，我可不是教授，二没有项目，三不出去讲课，混日子而已，所以“以我这样的条件”，过过平常小日子就可以了。

老驳壳闷闷地走了一会，叹口气，你爸妈也是白培养你。过了一顶小桥，就到了老街。老街破败了，明清时的老房子拆了一大半，剩下暂时没拆的，屋檐上长了半尺长的草，屋外头摆了马桶和痰盂，破碎的窗玻璃用塑料膜蒙一蒙，过一天算一天的样子。沿街店铺大多关了门，依稀看出这家从前是卖糕点的，那家是卖剪刀的。接连经过几家寿材店，蓝底白字“殡仪一条龙”，花圈和寿衣重重叠叠，老人坐在门里，漠然看着外面，或是低头折锡箔。一辆蓝色大卡车停在路边，驶离南楼。

父亲的日记本，锁在抽屉里，更像是一本隐秘的家族史。我每次避开他翻阅，都有回望父辈一代人艰辛劳作历史的感伤。

日记是从1972年开始记录的。那时的父亲18岁，高中即将毕业，父辈皆为农民，他当然没有希望继续上大学，所以他的日记本里，一边激情昂扬地写着标语口号似的《论人生理想》，告诫身边同学，应该为国家前程而努力奋斗，一边很务实地记录着如何栽培傻瓜的技术。想来那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有些不甘的吧，那本日记，还是学校给予他这样一个“文艺宣传战士”的奖品，他又热爱文字，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可即便如此，他也逃不掉回乡务农的命运。那时的奶奶，有些怕事，看出父亲思想动荡起伏，被村长找去谈话，便趁他没有注意，将他最喜欢的《聊斋志异》和其他书籍，都全部扔到炉灶下烧光。大约，这样的一把大火，将父亲还向往着外面世界的心，给彻底地烧成灰烬。所以此后父亲的日记本里，除了一些自娱自乐创作的歌曲、小说、散文，便再也没有了高谈阔论的人生理想。而关于栽培农作物的脚踏实地文字，开始在父亲兼做日记、摘抄本、记账本等多项功能的笔记本里，频频地出现。

那个时候的父亲，还没有结婚，所以在劳作之外，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文字倾诉。他写村子里编起席来双手灵动如飞的年轻嫂嫂，用满腔的热情记录着乡村的变化，评价电影《卖花姑娘》和《英雄儿女》。

在与母亲结婚以前，父亲不停地在乡村寻找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本里不只是记录庄稼的种植，还有编织柳条筐

婚礼就摆在热水瓶厂的食堂。那一天，小伙伴们全来了，热闹得不得了。一起长大的光屁股兄弟里，水根是最早结婚的一个，其他几个人，我爸刚从师范回来，在中学当老师，眼镜即将去北京念研究生，红喜进了“国二厂”，阿小在供销社当采购员。就像那年的《新华字典》对“前途”一词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学习机械制造专业；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老驳壳给我泡了一杯茶，自己点上一支烟。烟雾袅袅，老驳壳问，米兰克阿晓得？我说哪个不晓得，慕溪镇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做衣服的，好多大领导来视察过。

老驳壳说，那年我要去米兰克，热水瓶厂先是不准我辞职，后来又派人来收回这套房子。我房门大开，赤个膊，在厨房间登登登切肉。他们在外面叫我，我对他们笑笑，说，你，你，进来说话。

结果呢？我问。一帮缩货。老驳壳哈哈大笑。我想起一些往事。米兰克开业那天，慕溪镇中心小学全校停课，我和同学们穿上白衬衫和白球鞋，捧着家里拿来的塑料花，在食堂集中。听说有外宾要来，大家都很高兴。校长举着小喇叭，指挥大家排练。校长说，外宾来的时候，要大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外宾走的时候，要喊“欢送欢送，热烈欢送”，听懂了吗？一起来一遍，全体都有，听我的口令，一二三——

二十多后，我们整装出发了，队伍浩浩荡荡地横穿了镇中心，来到一另新落成的厂区门口。我们在马路两边排成几百米的长队，翘首盼望外宾的到来。一个小时过去，又一个小时过去，午后的太阳晒得人昏昏欲睡。校长一路狂奔，说人来了人来了，看我的手势，全体都有，预备起——

外宾果然慷慨，事后送了每个到场的孩子一罐可乐。对很多小镇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喝到这种甜甜的、带气泡的液体。大家不停地打嗝，咯咯咯笑个不停。有个农村同学因病错过了这场盛宴，后来他一个劲地问我，可乐啥滋味？比橘子水还好吗？

进米兰克后，老驳壳给自己起了个日文名字，叫松井一郎。松井的出处是《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大队长，“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那个。有人骂老驳壳是汉奸走狗，他听到了，冲上去就打。

凭本事吃饭，赚日本人的钱，这也算汉奸？老驳壳气呼呼地说。最风光的那几年，他从操作工升到线长，又升到工段长，工资涨了好几级，人称“拿摩温”。日本人对他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语夸奖他，松井君，好样的。

他曾送我一件夹克衫，是小镇人没见过的面料，据说在日本的商场卖到几万日元，相当于我爸妈大半年的工资。老驳壳眉飞色舞，他是怎样趁着日本主管不在，托人从次品仓库里顺出一件，又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流水线上改。跟正品一式一样，一点都看不出来，老驳壳得意地说。

米兰克之后，合资企业在江南的小镇落地生根，“外宾”也就见怪不怪，谁没见过几个“东洋矮子”、“台巴子”呢？米兰克的辉煌持续了数十年，随着市场饱和，用工成本增加，加上土地、税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到期，日本人决定撤资了。

老驳壳失业了。热水瓶厂是回不去了，别的企业只愿意招年轻人，他只好见机行事地做一点小生意。据我所知，老驳壳卖过水果和奶茶，贩过三七和虫草，开过饭馆和舞厅，无一例外地惨淡收场。有一回，他搞来十几台旧电脑，开了小镇第一家网吧。网吧生意红火，

引来了众多实力雄厚的竞争者。他迅速地落败，撑了几个月，不得不关门走人。当然，也有好消息，比方热水瓶厂改制，老驳壳通了路子，花了两万块钱，把那间筒子楼买了下来，算是有了不动产。

他酒喝得越来越凶，经常人事不省地被抬回家。在此之前，要么站在马路中央引吭高歌，要么发表演讲，胡乱“放炮”，老驳壳的名号，就是那时候叫出来的。

妻子要跟他离婚，几次带女儿住回娘家，每一回他都腆着脸，低声下气，好话说尽，把人接回来。最后一次，他站在岳父家楼下等了一天一夜，直到认识的人过来跟他讲，你回去吧，人家早就爬窗子走了。

女儿判给了妻子，他因此大醉了几天。有个清洁工发现他一大早醉倒在垃圾堆里，街道办找到我爸，我爸把他背了回去。

镇上人都知道，他未必是个好丈夫，却是个十足的好爸爸。他父母死得早，女儿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当年没有尿不湿，他一个大男人坐在大院内，给女儿洗尿布。女儿念书了，他负责接送。刮风下雨天，我经常看见他女儿坐在自行车后座，红色的雨衣裹住小小的身体，两只脚一荡一荡。他女儿在小学里很有名，人人都知道她有个合资企业上班的有钱爸爸。在一毛五一根橘子棒冰的年代，她的零花钱总是最多的，彩色橡皮和自动铅笔盒总是最新潮的。

离婚后，他有几次拎着烧菜的黄酒来我家，我爸拗不过他，就陪他一起喝。一瓶半后，老驳壳开始高声咒骂女人，继而失声痛哭。

前年他女儿结婚，老驳壳来我家借钱，说前妻不让他参加婚礼，他不管，他要去，这是他的女儿，他不去谁去。不仅要去，还要给女儿包一个大大的红包。我爸一声不响，拿出两万给他。那时他已经成了“脱底棺材”，这里混混，那里荡荡，老酒吃吃，牛皮吹吹，低保全换了老酒。喝高兴了，掰指头算算六十岁还有几年，到那时候，每个月可以拿到两千五百块的退休金。

时候不早了，我起身告辞。老驳壳像想起了什么，说别急，你先坐会，我去就来。

一支烟的工夫，他拎着一整只烤鸭走进来，对我说，拿回去。我说啊呀水根叔，这我怎么好意思。他不耐烦地摆摆手，废话少说，赶紧走。



日出而作——雨后（水彩画）苏军权

# 父亲的日记本

安宁

多不过一千，最少甚至一百，都是银行定期，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是一个农民对安全感的存储。他用这样的方式，与生活讲和。

至于在村子里做赤脚医生，养殖蘑菇，去山西采煤淘金，做煎饼，捉蟋蟀，在父亲的人生中，不过是一些小的波浪，它们时不时地就跃起，给予父亲生活的激情，但却最终落下潮头，回复至平静的农民生活。他的日记本，因此丰富多彩，有对各类疑难病症治疗方法的记录和研究，蘑菇对光照水分的需求标准，在山西挖煤分文没有挣到，但回乡途中依然花费几元钱洗澡理发的简单记载，还有摊煎饼时，每家每户所欠粮食的记录。曾经在，我读小学时，因为他的手表被人偷去，母亲与他大吵一架，气愤之下，他悄无声息地买火车票去了武汉，投奔远方亲戚，并试图在那里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而不知他的去向的母亲，则焦虑地四处找人算卦，打探他的消息。父亲在一个月后，才肯写信。而那封信，也是亲戚代笔。我记得不识字的母亲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信，让我和姐姐读给她听，因为字迹潦草，我们读得磕磕绊绊，招来母亲一通责骂，她用呵斥我们白白读书的方式和流泪倾诉内心的悲伤。一个月后的深夜，

前段时间去位于云南红河州之北的弥勒市采风，满脑子里好奇的就是这座全国唯一的以“佛”命名的县级市与那位大腹便便的“弥勒先生”究竟有啥关系？不曾想，几天的“风”采下来，东走走西转转看了不少地方，除了在锦屏山经过攀登1999级阶梯一瞻那尊高19.99米的弥勒佛像外，再也找不到这座红土之城与弥勒佛有任何联系，哪怕是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呢。虽然后来也知道了自宋代起这座城市命名或就因地彝族“米罗”的发音而来，但脑子里依然固执于两个“弥勒”间的关系，直到我们一行即将离开弥勒之际，蓦然想起位于北京潭柘寺弥勒殿中的那副名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才仿佛若有所悟，当然也仅仅只是“自以为”而已。

弥勒葡萄、红灯盏花、弥勒卤鸡、弥勒榴柑、弥勒土鸡、南瓜焖饭、弥勒毛驴、竹编竹插工艺、弥勒冬瓜蜜饯和弥勒黄金梨……这样一份传统的弥勒十大特产清单清晰地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这里曾经的产业结构就是典型的“农耕+食品加工”；二是即便贵为此地十大特产，大部分还必须加上“弥勒”二字为前缀，意味着这些物品并非为其所独占，而只是有些许特色而已。然而，时过境迁，而今的弥勒人在介绍起自己的家乡时已很少津津乐道于此，他们不是以自己现在拥有的红酒、红糖和红云（烟）这“三红”为傲，就是以温泉和种种特色小镇为荣。如果说“三红”还是传统农耕产业的现代化升级版，那么后者则无疑是一些以旅游、休闲和健康为特色的现代产业新板块之萌芽与成长。据当地友人介绍：云南省为建设“旅游特色小镇”，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特色、产业、生态、易达、宜居、智慧、成网”等七大要素。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态中，愿望与现实间的巨大差距、“挂羊头卖狗肉”的案例也并不在少数。面对如此规模的“特色小镇”建设热，会不会出现“有小镇无特色、有物产无人气”的尴尬呢？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们走进了东风韵文化特色小镇。

这座位于弥勒之南的小镇有着滇中“普罗旺斯”之誉，如果说它与法国的普罗旺斯有什么相似之处，无疑也就是那大片的薰衣草花海了，在微风中摇曳着充满着浪漫气息的紫色薰衣草混搭着荷兰范儿的风车，确有些许置身异域的恍惚。不过说句扫兴的话，这固然可以算作东风韵的特色之一，但真的确算不上什么大特色。至少从目前看，如果没有农垦展览馆和万花筒艺术馆这样的地标性建筑，东风韵的文化创意当会逊色不少。在这些建筑的艺术之美和创意之奇面前，文字的描述只会见出苍白与孱弱，但它背后所透出的观念与思维或许则是文字表达可以胜任的。

如果用最简洁的文字来概括，在东风韵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我受到最强烈的震撼则莫过于在这里不时可以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在那座充满现代艺术陈列技巧的农垦展览馆中，通过实物、文献和人物访谈等材料，展示的却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那些来历不同的农垦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屯垦拓荒的奋斗史，而更有意味的则是今日之东风韵恰就是建设在当年的弥勒东风国营农场的原址上，历史与现实在这里无声地被连接在了一起。至于那座万花筒艺术馆，整个建筑群的设计无疑是超现实加后现代的风格，但古朴的材质、彝族的文化共生向上的理念又不时依稀可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着无声的交流。无论是历史与现实的连接，还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折射出来的都是一种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综观东风韵小镇的建设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次敞开心扉、以开放姿态不断寻求合作的吸纳之旅，通过与高校的沟通，促成艺术院校实训基地来这里落户，截至目前，已有罗旭工作室、叶永青工作室，云南红土情等艺术机构入驻，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美术学院实训基地也落户东风韵小镇；而被誉为“云南两大国宝级”之一的本土艺术家罗旭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在东风韵小镇后，又利用自己的“名人朋友圈”，吸引到张国云、李亚鹏、叶永青、萨顶顶、杨丽萍等的关注。这种利用“名人效应”，带动更多的艺术家来东风韵小镇落户，从而扩大了东风韵的社会知名度，推动小镇建设向更高品位延伸和发展。

这种持续的合作、开放、包容自然需要“大肚能容”的胸襟，仅凭这一点两个弥勒之间是否就不仅仅只是在文字发音上的巧合而是有了某种精神上的契合呢？当然，今日之弥勒尽管有了“大肚能容”的胸襟，但沦为“世间可笑之人”的风险依然存在。小镇建设不仅尚未竣工，而如此庞大的这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当更为艰巨。

红土地上的这曲东风韵如何垒就？还看今日弥勒人。

潘凯雄

# 谁在用红土垒就这曲东风韵

开一些收购来的废书报纸，看到一些心灵鸡汤类的人生格言，就摘抄几句。窗外的雨沿着长了青苔的房檐滴滴答答地落下，我在远方的大学里开始写作，弟弟正在茫然地为高考而念书，母亲沉沉睡去，那台破旧的电视一到雨天便潮湿看不到图像，父亲就这样在寂寞中打开日记本，记账，并写下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没有人与他交流，即便是母亲，也不曾真正地理解过他。生活从那些关于国家、革命的激情思考，彻底地成为简单的数字和账簿。他或许忘记了曾经喜欢四大名著的文学时光，忘记了去山西武汉打工淘金的理想，忘记了他还买过流行歌曲的书，自己制作过笛子，会吹奏歌曲。他甚至为了省钱和身体，很坚决地戒掉了烟酒。他是新闻联播忠实的观众，真诚地喜欢着每一部 CCTV-1 播出的可以慰藉他夜晚孤独的电视剧，并认真地向我推荐。他的脾气，而是生活境况的慢慢好转，和疏通下水道的一技之长，及始终不曾丢掉的土地这一最后的“养老保险”，而慢慢变得和缓，不再似昔日那样有一触即燃的暴怒。

而父亲依然将一本一本的日记，像存折和他的钢琴一样，细心地锁在抽屉里，就像锁住一个家中所有人都不会告知的秘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曾经翻看那些日记，我们彼此永远不会交流这些私密的话题。我想这样的记录，只属于他的内心。我只能这样看着他在无事可做的傍晚，提着马扎，拿着小小的收音机，像许多退休了的老头，在县城一角的余晖里，投入地看一些不相识的闲人，下一盘不计输赢的象棋。

父亲知道那个时候的父亲，他已经不再关心曾经写下的日记。